

09
纪念嘉定解放四十周年专辑

政协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嘉定文史资料
89



选辑
(三)

前 言

1949年5月13日，这个嘉定人民难忘的日子，是嘉定解放的光辉节日，迄今已经40周年了！

抚今忆昔，回首当年艰苦的历程，更爱今天的美好时光。

饮水思源，重温那时翻身的喜悦，难忘前辈的艰苦奋斗。

嘉定的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地下党员同志配合工作，各界人士团结奋斗的伟大战果。

为了纪念嘉定解放40周年，在前辈们的支持下，我们突击编印了这册专辑，从各方面记述嘉定解放前后这段战斗的经历。尽管由于时间匆促，资料收集很不全面，但是从中多少能看到一些当时的情景。重温当年解放嘉定的史实，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使人能进一步感到胜利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把握今天，振奋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能使人更加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

面临当前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虽然形势严峻，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各界人民戮力同心，必将无往而不胜，度过难关，夺取胜利！

今年又是建国 40 周年,我们还将编辑出版专辑,以志纪念。我们殷切期望各界人士给予大力支持,把 40 年来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关史料惠寄给我们,为家乡积累精神财富,提供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资料,促进家乡的全面发展,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嘉定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嘉定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目 录

嘉定解放后的第一张布告·····	1
从北京到南翔——纪念南翔解放 40 周年·····陆象贤	2
我的心愿——并忆嘉定解放二三事·····廖 临	8
这是人民哺育的结果——纪念嘉定解放 40 周年 随笔·····秦 浩	11
嘉定解放 40 年随感·····张烨宇 潘仁爱	15
关于解放前在嘉定接受地下党领导的一些情况 ·····周明星	17
丹忱献解放，往事常萦心——纪念嘉定解放 40 周年·····潘世和	23
嘉定解放前后·····武钟琦	27
解放前夕地方财政移交经过·····许丽栲	29
往事回忆·····孙 镇	31
我在南翔工作的回忆·····李育英	38
中共南翔市委的第一次会议和我接受的第一件 任务·····鞠国栋	42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张昌革	45
欢歌乐舞庆解放·····钱乃之	47
追忆介绍李宗康同志入党·····金 亮	51

回忆嘉定解放前期卫生工作的片段·····	顾学箕	54
唐行乡连俊村名的由来·····	姚景韩	59
迎解放智擒敌兵·····	沈寿侯	62
经历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教育工作·····	冯家麟	64
廖城转折的一天·····	陈叔达	67
五月十三·····	张烨宇填词	70

嘉定解放后的第一张布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东军区 嘉定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安字第一号

查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其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着令即日解散，停止任何活动，改过自新。各该组织人员，应即依法向本县公安局登记，交出一切反动证件及档案；如有武器者，更应交出武器，民主政府当分别首要、胁从，一本宽大政策，从宽处理。倘有隐瞒不报或阴谋活动者，一经查明，定予法办。仰各慎遵，切切此布！

主任 王 肿

副主任 王雨洛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十日

从北平到南翔

——纪念南翔解放40周年

陆 象 贤

一、在北平

1949年1月21日，我奉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之命，从上海撤往香港。在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的直接领导下，我在九龙千家驹经济研究所，查阅和研究关于上海的经济资料，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3月22日，我随刘晓同志从香港乘船前往解放区。4月初，到达北平，住在中南海。我的工作，为刘晓同志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整理关于上海解放后维持生产和供给人民生活的物资以及运输工具的资料。同时，刘晓同志和我参加迎接上海解放的经济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共举行7次，先后参加座谈会的有千家驹、沙千里、章乃器、施复亮、胡子婴、赖亚力、黄炎培、朱学范、盛丕华、盛康年、张纲伯、包达三、吴羹梅、罗淑章、杨美真、俞寰澄、狄超白等。上海工商业经济界著名人士为迎接上海解放，研究讨论上海解放后的金融、财政、生产、劳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于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关于争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协助接管上海工作的指示》指出：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帮助可能发生很大困

难，……是否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项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收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

座谈会在六国饭店举行，因为上海工商业经济界著名人士大部分住在那里。刘晓同志和我从中南海到六国饭店参加座谈会，每次就在那里住一宿，以便同参加座谈会的各位交谈，倾听他们对上海解放后将会遇到的各项经济问题的对策方面的意见。在刘晓同志到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同志汇报的资料里，也吸收了座谈会上各位发言中的若干建议。

我在中南海，见到了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领导同志，他们正忙着同以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张治中一行也住在六国饭店。我们去参加上海经济座谈会时，常遇见他们。当时，我对和平谈判很关心，所以每碰见南京的和平谈判代表时，就仔细观察他的情绪表现。和平谈判从4月1日开始，经过半个月谈判，中共代表团根据八项条件为原则，同各方面磋商后，与南京政府代表团于4月15日拟定了和平协定草案，并且要求国民党政府于20日以前表示态度。到了4月20日，我同住在中南海的几位同志，到勤政殿等候观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和平协定签字仪式。等了好久，不见张治中一行到来。才知道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和平协定。4月21日，我听到了中南海新华门对面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的广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我在新华门里伫立了很久，听广播，精神振奋，心花怒放。4月23日，人

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率领下，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当天晚上，我们在中南海举行庆祝大会，叶剑英同志弹钢琴，秧歌舞队龙腾虎跃，整个大殿充满了欢乐。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乘火车南下，迎接上海的解放。

二、在南京

在南下的火车上，我见到了张执一同志，他是我在台湾工作时的上级领导。中央已决定他不回到上海工作，改派他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长。他为了把上海的工作交代清楚，所以在火车上向饶漱石、刘晓等汇报工作。我还见到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全国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的上海派来的代表们，其中，有些熟人，过去都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离开上海到解放区的，现在相聚在一起参加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工作，大家心里格外高兴。

4月25日，火车开到淮河边，因为铁路桥被炸断不能再前进。在淮河边，张执一同志与我告别，他同这一列车要赶回北平，运送接管武汉的干部。我们从渡桥上跨过淮河，从蚌埠乘卡车前往浦口，4月26日在浦口等到天黑，才乘渡轮过长江到南京。因为这是唯一剩下的渡轮，为了防空袭，到了晚上才行驶。在南京的江岸上，国民党军队埋的地雷还没有完全扫除，人民解放军为我们清出一条甬道，让我们安全上岸。来接应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总统府”，我们巡视了一遍，看到“代总统”李宗仁的办公桌上的凌乱样子，想象得出他们逃亡的匆促情景。在“蒋总统”的会议厅里，他穿军装佩“总统”绶带的巨大画像已倒在地上，画像上留下了我们的脚印。4月下旬南京的半夜还是有些寒意，又来汽车将我们分送到原国民党政府各部的

大楼里过夜，27日，送我到中央饭店去住。

在南京使我难忘的是二野、三野的干部会师大会。大会在晚上举行，宋任穷主持大会，二野、三野的领导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他的讲话不长，给我的印象是简练明确。刘晓新任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他在讲话中强调地下党干部要同老解放区干部团结。接着在“国民大会”礼堂开大会听饶漱石讲城市政策，他的讲话很长，又是在晚上开会，散会时已经夜深了。我们到南京后，几乎天天开会听报告，反复讲接管城市政策。

刘晓同志到中央饭店来看望我，他告诉我：华东局要住到丹阳去。4月底，接管上海的干部乘火车离开南京，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到车厢里同我们亲切握手送行。

三、在丹阳

我们到了丹阳，从北平来的和从山东、苏北来的接管上海的干部集中在这里，但住得分散。刘晓同志把我介绍给饶漱石，留在中央华东局当秘书。华东局机关是一座二层三开间的楼房，有个不大的院子，四周有围墙。客堂间是饭厅，只有一张桌子坐满8个人，饶漱石、陈毅、刘晓、刘少文、舒同、一位秘书处长和我，还有一位已记不起来了。刘少文在楼下办公，陈毅在客堂楼上办公，饶漱石在厢房楼上办公。他在前厢房，我在后厢房，整理东北、华北各城市如沈阳、天津、北平、石家庄等地的接管报告，都是用复写纸的抄本，有些字迹已模糊了。不久，饶漱石派我参加政策研究小组，组长是黎玉，组员还有冀朝鼎夫妇等。这个小组在另一个地方办公。当时，在新解放的城市里发生了不少问题，如常州的开仓济贫，无锡的加工资，其他一些城市在接管中也有些问题。因此，三

野首长决定暂缓进上海，在丹阳组织接管上海的干部反复学习城市政策。

5月10日，陈毅同志在丹阳向会集的南下接管人员讲话，他说：对进占上海，要有两个正确态度，一方面接管上海大城市要有革命胜利信心，一方面要有虚心谨慎的态度。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有全党、全世界性质。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调入城纪律。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上海作战的指示：以建设为前提，破坏必须服从建设，而既要歼灭上海的敌人，又要保存这座城市，将一座完整的上海交到人民手中部署作战。

四、进驻南翔

1949年5月24日，我们从丹阳乘火车前往南翔。火车将近苏州的时候，已是晚上了，刘晓同志找我去见陈毅同志。陈毅同志问我，这一列车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了南翔可以在哪些地方住宿？我再三盘算南翔有几处可以集中住人，因为列车上只有少数首长的警卫员，没有部队，都是干部，已到深夜，住得分散，不好保护。我向陈毅同志建议，放慢车速，到黎明进驻南翔。他同意我的想法。就命令火车司机放慢车速。终于在25日黎明到达南翔，为了防空袭，所有干部立即分散在车站附近村庄和南翔镇各处休息待命。

我同一部分干部被分派在车站附近的村里休息，恰巧是惠民中学的学生周志善的家。我们正在场地上搭灶用青蚕豆煮粥。周志善的母亲认出我来，就来招待我。老人家看到我吃粥，就拿出咸鱼来给我佐膳，看到我躺在地铺上，就让我到她

家的房间里休息。她家为了防备国民党败兵抢劫，蚊帐也收起来了，我就在一张“赤膊”床上睡着了。不多一会，刘晓同志派人来找我，要我到南翔镇上去见他。我到了镇上，看到解放了的故乡显得很宁静，镇容整齐，心里非常欣慰。刘晓同志在南翔邮局里等着，他一共通知了3个人，一位是李昌，负责华东青年团的，一位是学生模样的女同志，姓名已忘记了，还有我。他对我们说：华东局领导同志中午进上海，并把他在上海的地址给了我。我们正在谈话，门外的警卫员与人争吵起来，我出去一看，原来是房东回来了，因为我以前当过南翔邮局局长，彼此熟识。我向刘晓同志说明来人的身份，就让他回到家里。他是我在南翔解放后遇见的第二个熟人。这位房东当天下午步行回到上海，就把我已回到南翔的消息在同乡人之间传开来了。我从南翔邮局出来，在塔桥附近遇见第三个熟人是费茂泉。我在回到董家桥西的老家路上，遇见第四个熟人是张志霄。因为我是待命出发，不能逗留，见了乡亲熟人也不便多谈，到了家里见到了亲戚、邻居，都是平平安安的，他们看到我也平安回来，大家都很高兴。我的母亲和老婆、孩子在南翔战役前都住到上海去了。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心里也踏实了，就赶回驻地。当晚，上海派来了30辆大轿车（就是以前法租界的公共汽车）把全部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接进市区，虽在夜里，但还可在沿途看到一些战后的景象。我们的车队特意绕到南京路，再开到徐家汇交通大学落脚。这一路上的兴高彩烈的情景，虽然时隔40年，却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心愿

——并忆嘉定解放二三事

序 临

1949年5月13日嘉定解放，转眼已经40周年了。

1949年初为了准备解放、接管南京、上海、苏南城市，地下党组织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我和童礼娟同志按照组织决定，辞掉了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从上海回到嘉定老家。我们的任务是利用家庭有利条件，建立秘密联络点，保管党的文件资料，并准备必要时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志来嘉定隐蔽和指挥战斗。

当时我已入党七、八年，从学校走向社会，经历了好几个部门，不论革命形势起伏，总是生活在群众中，而这一段时间却切断了和群众联系，真正成了蛰居。罗明同志单线联系我们，向我们传达胜利形势，给我们布置任务。就在迎接胜利的曙光之时，倒反不能直接地感受革命群众的呼吸和脉搏，确也是相当“憋气”的。

5月13日迎来了嘉定的解放。当天晚上南下负责接管嘉定的王雨洛、王元昌同志找到我的住处，来取部分材料。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从老区来的穿了制服的同志和亲人，兴奋的心情难以名状。在微弱的、摇曳的烛光下，我们紧紧地握手，又是亲人的相见，又是对胜利的祝贺，还在那特定的斗争环境中互道珍重，互相勉励。王雨洛同志黝黑的脸庞，双眼炯炯有神；王元昌同志高挑的身材，十分和蔼，以至38年后在中共嘉太室

工委党史座谈会时和他们重聚（我当年10月就离开嘉定县委转去部队，一直没见过他俩），我一下子就忆起那个晚上难忘的相见和革命的情谊。

由于秘密工作的纪律，我以后才知道我和童礼娟同志保管的材料，包括旧政权中乡镇以上人员的情况、敌特的情况、工商界和文教界的情况等等，有的经过詹彪、金伏兴、潘世和等同志的整理，有的则是原始的文书档案、图表，有的还曾经过其他同志的整理送去苏北我解放军。这些材料，后来又编成《嘉定概况》，解放后发给县、区级领导同志供工作参考。

解放后没几天，大致是5月下旬，在县政协的旧址办了一个训练班，训练班的目的是让地下党的同志和一部分积极分子接受基本的革命形势和政策教育，以便投身接管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地下党的同志们的会师，各个支部的、原先小组活动的、单线联系的，都汇合到一起来了。参加的人员还不齐全，有的因工作需要脱身不开，有的因工作需要还不能公开参加，譬如以后知道金伏兴同志的情况便是如此，训练班是地下党同志们欢庆胜利的聚会。王雨洛、苏君彦等同志为我们作过几次报告，活跃地带大家唱革命歌曲。我们除了学习、讨论，还大唱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等歌曲激励着我们的斗志。“五月十三嗨哟嗨哟，嘉定解放嗨哟嗨哟”的改词歌曲记得也是在训练班上唱开的。训练班上年纪大些的有武钟琦同志等，年纪轻的李方同志等还不足二十岁。其实按照当时的年龄，大家还正当年青，风华正茂。大伙儿第一次吃革命的大锅饭，大碗大碗地啖着家乡的鲜美的蚕豆，那美味至今萦怀不忘，大伙儿还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记录下了那难忘的时刻。看到这些旧照，想起许多同志此后在不同岗位上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也有不少同志经受了許多磨难；还想起为解

放嘉定作了大量工作，为人极为诚恳、热情的詹彪同志先我们去世等等，真是感慨万千，心潮难平。

紧接着是中共嘉定县委在天主堂组织了地下党同志和南下同志会师大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迎接解放的欢欣心情再次推向了高潮。

嘉定解放至今 40 周年了。嘉定从大革命时期起，至解放以前地下党就有了 20 多年的光荣斗争历史。“五抗”斗争的先烈们（其中有我的堂叔廖家弼烈士）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还有许多革命同志离开家乡嘉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诸多贡献，包括牺牲生命，确实是前仆后继。去年读了县委党史办和县民政局编的《嘉定革命烈士传略》，收录嘉定籍和客籍在嘉定牺牲的烈士达 497 名之多，深受激励。

解放前夜，在中共嘉太宝工委徐嘉、罗明同志领导下的斗争，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它继往开来，显示了党的地下斗争的力量，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和它本身的纯洁和坚强。我为家乡工作的时间很短，贡献极少，但我要把嘉定的光荣革命传统永远铭记在心，还要以此教育后代。这也是我迎接嘉定解放 40 周年时的一点心愿。

这是人民哺育的结果

——纪念嘉定解放40周年随笔

秦 浩

今年5月13日，是嘉定解放40周年纪念日。嘉定是我生长的故土，虽然我远在北京，但和嘉定50万人民一样，怀着喜悦和依恋的情感，歌颂这一历史性的纪念日。

我虽然是嘉定的本乡本土人，但为了谋生和求学，曾较早地离乡在外。迄今60多年的生命中，我在嘉定生活的约约有18个年头，包括呱呱落地后的童年在内，还不到三分之一。然而，有意义的是，在我们祖国大地上“钟山风雨起苍黄”的重要时刻，我回到了哺育过我的故土，与家乡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一起艰辛而又紧张地度过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峥嵘岁月，并为家乡人民的解放翻身尽了自己的义务。在我过去的岁月中，有几段生活是最值得回味的，其中有欢乐，也有悲痛，而这40年前后的几度春秋，是一段深感欢乐和欣慰的生活。

我于1949年2月从福建厦门重返故乡，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时，胜利的红旗即将插遍江南大地。我求学，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我从事地下党工作的所在地——厦门市，已成为反动派在大陆上进行最后挣扎的桥头堡，地下党的处境非常困难，发生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地下党组织决定，为了保存力量，开展新的工作，凡在以往历次公开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比较显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必须尽快撤离厦门。我虽然在厦门已生活了两年半，但还不能讲闽南话，因此不能撤离到闽南游击区去。组织上要我与浙江籍的地下党员一同回上海，或去找闽

浙赣地下党所领导的浙南游击区（因我参加的厦门地下党组织属闽浙赣省委领导），或在上海一带自行寻找地下党组织参加工作。当组织上将决定通知我后，我就和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潘世超联系，告诉他我此次北返的意向。因为我和他是勤业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又是表兄弟，可以用明确而又适当隐蔽的话来说。这时，潘世超已被接受为地下党员，并已决定他的工作就在嘉定方面。因此，当我回到上海后，潘世超就告诉我：

“嘉定有工作，需要人。”这样，我告别了浙江籍的战友，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当时作这一选择和决定，其中确实含有不少偶然性。

但是，今天想来，这次带有一定偶然性的重返故乡，也含有深刻的必然性。我这次返回故乡，不同于1942年的那一次，那时我在上海当学徒，回乡时是个谋生无着的落魄者。也不同于1946年那一次，那时是期待高考入学通知书的徬徨者。而这次返回故乡，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我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尽管我当时还只是初知革命的ABC，但要履行自己入党誓言的心情是真诚而又迫切的。因此，当得知“嘉定有工作，需要人”时，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认为这是我为家乡人民工作的机会。到今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我愿意为家乡人民工作的感情，我的思想的质的飞跃，是由于家乡故土人民给我滋养和教育的结果，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发展的必然。

为什么这样说？先就近的而言，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国家处于两个前途命运的决战之中。而我呢，如前面说到的，我当时思想上还是一个徬徨者，想依靠“工业救国”获得个人出路的幻境正在破灭，而走革命救国的道路，则还是不明确的。就在这时，一方面，实际生活给了我反面的教育，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处处与人民的利益直接相悖，也和我的期望相